

「台灣的自然書寫」

一個自然作家在台灣

劉克襄

1981年，我嚐試以鳥類做為散文的題材，後來被視為台灣較早的自然寫作者之一。在這之前，多半以一個新詩的後進，在文學的場域裡摸索書寫的奧義。或許，美國登山家詩人加里·史耐德（Gary Snyder）的詩 [1]，曾經在大學時幽微地啟發了我，讓我不自覺地在處女詩集《河下游》（1978）裡 [2]，不斷地指涉及森林、河流和田園，但我的創作面向，仍無法確切地表達自己和自然的互動關係。為什麼會突然地以鳥類當作素材？可能和自己畢業後，服役海軍有著相當的密切關係。1980年初，我隨軍艦在台灣海岸旅行，一年半載間，遇見大群海鳥遷徙、觀察軍艦炮襲離島海鳥等等奇特經驗，讓我對鳥類產生好感。隔年五月二十日退伍，多數人開始尋找工作時，我卻未積極地謀職，反而在隔日造訪台中野鳥學會，急切地想要到野外，繼續鳥類觀察。

剛開始以鳥類為創作題材時，台灣在動植物方面的自然科學知識和野外調查都相當貧瘠。我常援引中國傳統文學的文獻和史料，豐潤議題的內涵。《詩經》裡的虫魚草木、唐宋詩詞裡的鳥類意象，乃至明朝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的藥學知識，都是靈感拾取的泉源。個人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旅次札記》（1982），大抵是這樣完成的。

不過，這種情境很快就過去。當時，整個台灣時空環境迅速轉變，工業科技發展伴隨而來的土地污染和破壞，讓我無法耽溺於古典詞藻的情境裡，或者嚮往傳統知識分子的隱逸角色。一邊散文創作時，我亦成為一個充滿新聞敏感度的生態報導者。

事實上，在我嚐試以自然生態為作主題時，台灣早有兩位女作家韓韓、馬以工，以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」[3]系列的環境生態報導，在報紙副刊，陸續發表保護紅樹林、東北海岸等文章。這一系列報導受到相當熱烈的迴響，加快了公權力執行的決心。後來，我們也把此一專欄視為台灣自然生態意識啟蒙的重要發端，同時是台灣自然寫作早期的代表性篇章。

1982年時秋天，我投入台北關渡平原的鳥類長期調查，並定期撰文，希望這塊沼澤溼地能夠闢建為自然公園 [4]。那幾年，台灣也有許多作家和記者，選擇以生態環境做為報導題材，在報章和雜誌媒體發表。當時的背景時空下，以公害污染為新聞的環保事件，最容易成為重要話題。這類環保的文字和攝影報導，也常成為最直接揭露台灣生態環境問題的第一線證據。但這些報導文章是否為自然寫作的一環，始終沒有妥切的定論。

除了這些環保議題的報導文章外，當時台灣還出現了多樣地散文類型的自然寫作者。其中最受到注意的作家，無疑是陳冠學和孟東籬。這兩位文學創作經驗豐富的前輩，以自然為書寫題材時，都試著從中國傳統文化裡尋找可能。陳冠學隱居大武山下的田園生活，積極地援引老莊的無為思想，做為摸索生活的奧義，孟東籬寄居花蓮海濱，提倡愛生哲學，學習陶淵明等文人隱逸鄉間的理想。在他們的作品身上，可以看到典型知識分子對社會體制不滿、寄情山水的情結，以及對漢人「天人合一」自然觀的信奉。

這個充滿反抗體制，美善的傳統繼續被嚮往，更十足反映了知識分子對工業文明的疑慮。田園將蕪胡不歸的實踐心境，隨著社會主流的科技掛帥意識，反彈愈加強烈。有趣的是，他們所追求的生活信念，和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梭羅《湖濱散記》所要闡揚的某些意理，也不謀而合。這使隱居住在華爾騰湖的梭羅形貌，在上個世紀末的台灣受到相當稱許，乃至成為一個無可置疑的自然神話。

另一方面，有些較年輕的文學創作者，諸如凌拂、洪素麗、王家祥等人，基於對自然的愛好，或有自然科學背景的訓練，或出自野外經驗的養成，紛紛嚐試在文學作品裡表達對自然環境的關愛。他們的作品所呈現的內涵，日後受到西方生態環境思潮的影響，明顯地超過傳統中國所揭櫫的自然信念。儘管這些創作者亦認同前述前行輩作者的生態理念，但在實踐上，似乎也坦然接受了都市發展的現實性。努力地在這個對立間，尋找一個生活寄託的平衡點。我個人的創作，不論在詩、小說或散文的試煉，應該也不脫這一類作者探討、追尋的面向吧。

從八〇年代自然生態為題材的作品大量出現，以及展現一定程度的不同樣貌，我們確信台灣自然寫作的突然興起，有其島嶼生態環境衝擊下實然和必然的關係，也確立了此一文體在台灣現代文學的歷史裡，獨樹一幟的重要性。甚至，在此一階段，看到了台灣文學和大陸文學本質的重要差異。

九〇年代中旬時，台灣知名的文化觀察者楊照，曾撰文認為，面對生態環境的迅速轉變，台灣的自然寫作大體呈現的是一種焦慮不安的現象，尚未有長時沈澱的細膩作品。這項觀察相當犀利，但過於概念，只看到文學技巧的表意，無法深入探討，看到本質的核心意義。若觀察後來自然寫作的發展，其實這種焦慮不安，反而顯現自然作家和社會密切互動的必然性。

譬如，九〇年代時，因了環境立法的規範、生態意識啟蒙，以及影像傳媒崛起等等影響，以公害污染、垃圾傾倒為主的新聞，不再被寫作者視為重要的報導題材，或者形成社會運動的主力支援力量。相對地，非切身直接利害關係的自然生態保育議題紛紛出籠，諸如山地濫墾、土石流、流浪狗和瀕臨絕種動植物等，較為疏離的議題，反而受到更多社會人士的長期關注。這種生態思維和關切的微妙轉移，無疑跟整個社會生態意識大幅成熟有關。

只可惜，理念單純，深受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推崇的隱逸哲學，一時間似乎在生態觀念上後繼乏力。多數倡揚田園生活的作者，除了自我力行，並未在急劇改變的社會中，適切地提出更吸引人、更可具體實踐的環境生活哲學。在九〇年代末時，我們並未充分感受到此一類信念的廣泛張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接受體制內改造的自然寫作者，扮演社會改造者的角色似乎較為成功。他們積極介入或帶動各種自然保育組織、社區營造團體的運動，引出了更多生態理想家園的藍圖和淑世之可能。例如植物學者陳玉>、荒野探險家徐仁修 [5] 等人，一邊書寫，一邊積極參與團體和社區營造的行徑，都帶來社會運動的更大影響力。

後繼而起的自然寫作者，大抵也是偏向這種地方生態主義的形塑，而且屢有傑出的創作者投身，形成一個現今較為主流的民間自然生態論述。諸如廖鴻基的鯨魚書寫、吳明益的蝴蝶志爬梳、陳世一的生態人文旅遊、杜虹的國家公園生態經驗，或者連志展的高山美學等，其實都在自己嫻熟的領域裡，擴大書寫的範圍和題材。他們或有個人對自然類型的偏好內容，但在創作思維的方向上，大抵是立基於此一社區改造的基礎。

我個人在自然書寫上，從早期呼籲成立關渡自然公園，到九〇年代初，搶救黑面琵鷺（1992）時，雖然偏重鳥類的報導，以及自然志的爬梳。但後來的書寫，多半也集中在社區的改造和自然教學。三年小綠山長期定點的博物誌記（1992—1995）[6]，以及後來三四本和孩童自然教育相關的散文集 [7]，都是這個時期梭巡於城市近郊，觀察自然生物相的主要作品。那時經常遊走北台灣郊區，力倡都會區的「現實性觀察」。所謂「現實性觀察」，主要係質疑現代人回到荒野的神話，轉而面對多數人大部份時間無法花生活於荒野的現實。城市的公園、巷弄，市郊的小山才是經常面對的自然。真正的自然觀察應該從自家門口陽台和庭院開始。此段時間，我亦服膺城市「自然步道」[8] 的理念，不斷地尋找路線挑戰，試煉。不論從多數自然寫作者的寫作面向，或從我個人的創作歷程放大，整體而言，或許可以說，楊照觀察到的自然寫作之「焦慮不安」，其實也多元複雜化、深化了。這些都導因於台灣島嶼人多地窄的環境，以及急遽變遷的社會結構。而台灣的生態意識啟蒙時，正好又遇到政治的「解嚴」，整個社會進入長期的崩解和重整的狀態。「解嚴」讓人們可以自由籌組各種生態團體，亦能國內外到處旅遊。另一方面，自然科學知識愈來愈豐富，各類科普的經典書籍不斷被引進，需求者和喜愛自然觀察的人士與日俱增，而針對自然和現實社會生活的互動也不斷地被辯證、探討和實踐。新的生態思維和風潮亦迅速到來，甚而形成消費流行的商品機制。

九〇年代末時，生態旅遊逐漸被更多國人認可，各地鄉鎮社區競相定調為新型態的觀光內容時，一個長年浸淫自然觀察的人，難免會對這個流行現象感到憂心。再者，個人隨著年紀的增長，對土地的認同也蘊積了另一層次的看法，我不免想尋求另一種角度書寫的突破和實驗。晚近著重於台灣各地鄉鎮社區的書寫，或者出版北台灣山岳的健行記錄 [9]，都可視為個人集多年田野經驗，尋求另一種戶外生活價值和創作的突破，同時也是對當下生態旅遊觀念的積極回應。尤其是針對健行，提出了步行禪（walking meditation）的新漫遊精神，強調對台灣山巒的認知要有一個新的思維，以自然為名，結合人文歷史的意理，重新架構人和山對話的內容，跳脫過去縱走、登頂和征服百岳的心態。

但無論我的個人主張再如何鮮明，正確或者極端，都還是在整個自然寫作此一光譜裡打轉，應當視為一個社會現象，呈現某一個社會集體意識的狀態，而非一個人的挑戰或視野。自然寫作者絕不是一個孤傲不群的自由主義者，而是一窩螞蟻裡出尋找食物的工蟻。他知道無法像早年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，道不同不相為謀，小隱於社會一角，沈浸於自己的世界，摸索自然的奧義。他們必須妥協於狹小島嶼的當代城市文明，不斷地尋求各種對策，辛苦地找出因應之道。

一個自然作家積極地參與自然生態組織，或是加入社區營造的運動，多半是在這種認知裡必須扮演的社會角色。我們無法期待，台灣在短時間內，蘊育出一位像梭羅的自然寫作者，或者是一個深居簡出的鄉野作家，提出另一深層的自然觀。這是個島嶼的人文和自然環境，不是廣漠大陸的空間。社會背景不同了，高密度人口人下，產生的擁擠居住環境，以及快速而緊迫的工商社會關係，讓生態思維必須更具有廣泛實踐的可能和急迫性。

這種走向恐怕正是目前台灣未來生態保育的潮流趨勢，也影響了創作者的思維內容。在台灣，自然寫作者很難獨善其身，只扮演好自己。當他觀察一隻鳥時，他看到的也不只是背後的棲息環境，往往包括了周遭人群、城鎮的生活和政經問題。如此複雜狀態的觀察下，一個自然寫作者的作品裡所展現的「焦慮不安」，或許才是本質的現象，一開始即急迫地在文學情境裡，以隱遁為師，反而是意外的插曲，一種忽略現實的逃避。

但東方老舊傳統的智慧真的無一可取？或者只是時機尚未成熟？回顧此一半甲子的進展，除了自然生態意識啟蒙初期的摸索和試探，台灣的自然書寫者並未有充分的時間和空間，讓西方生態思維和東方傳統的自然觀，透過適當的對話，整合出一個新的生活價值觀。

有時我不免困惑，甚而有一種微妙的期許。或許，自己年紀大時，可能會潛心向原住民部落的傳統生活裡，尋求可能的自然智慧。一如史耐德，接合了精神與世俗的傳統，在唐朝佛教徒隱士寒山的作品裡找到心靈的依循。目前這樣的情形，在我身上尚未清晰的發生。但國內不少自然書寫者，慧心早開，在創作的過程裡，從西方返回東方，從當代生態保育進入老祖先的自然宗教觀裡，或早已開展，且在這個情境裡，圓滿地找到生活的皈依，準備跟社會映証了。

〔註釋〕

[1] 1955年史耐德開始翻譯唐僧寒山詩作，總共選錄了二十四首。1958年秋，所譯的二十四首和1965年將《砌石》(Riprap)和寒山譯詩合併出版《寒山詩集》，1970年代，台灣大學附近，雙葉書廊有出售。

[2] 自費出版，一個星期後，未出售的詩集多半銷毀。當時已經不滿意詩作呈現的內容。

- [3] 1980年元月一日聯合報副刊刊出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」專欄，第一篇報導主題為紅樹林保育。
- [4] 關渡自然公園於2000年元月成立，由台北市野鳥學會接管經營。
- [5] 生態學者陳玉峰於1991年創設「台灣生態研究中心」，為民間人文及自生態最活躍的單位之一，持續開辦「環境佈道師培育營」，課程含括台灣自然史、社會運動的實踐、文化觀察到生態倫理等之講述與現場體驗提倡環境佈道師。自然探險家徐仁修於1995年和友人李偉文等一起創辦「荒野保護協會」，目前為國內最活躍的生態社團之一。
- [6] 《小綠山之歌》(小綠山系列之一)、《小綠山之舞》(小綠山系列之二)、《小綠山之精靈》(小綠山系列之三) 1995 時報出版，1995年聯合報十大好書。
- [7] 共四本，一、《山黃麻家書》1995 晨星出版社。二、《望遠鏡裡的精靈》1997 玉山社，獲聯合報十大好書。三、《綠色童年》2000 玉山社。四、《少年綠皮書》2003 玉山社 2004 開卷十大好書。
- [8] 「自然步道」為台大植物系教授城孟提倡的都會綠手指生態理念，率先由主婦聯盟實踐，後來擴及各地城市社區。
- [9] 《安靜的遊蕩》2000、《迷路一天，在小鎮》2002、《大山下，遠離台三線》2004 以上三書皆由皇冠出版。《北台灣漫遊—不知名小徑指南》1.2 冊 2005 玉山社出版。